

反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罗 本 考

作者认为,近年来我国贫困地区推行的开发式扶贫有效地缓解了区域性贫困,增强了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力,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表现为经济贫困,又表现为文化贫困、社会贫困。文盲率高、人口膨胀、封闭保守、商品经济意识淡漠、劳动者素质低、社区功能不足等大量的问题仍是需要不断解决的关键问题。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扶贫开发需要正确处理的12个方面。

作者:罗本考,男,1929年生,江西省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反贫困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我国,它的特定含义是指,重点解决18片贫困地区、600多个贫困县、1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和摆脱贫困问题。对分散存在于其他地区的贫困户,也应加强社会保障。坚持推行反贫困计划,扶持贫困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在农村一项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任务。本文仅就扶贫开发实践中的几个问题抒以浅见。

反贫困与促进社会稳定

扶贫济困,历来是党和政府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社会政策,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几年,开发式扶贫作为扶贫工作成功的改革方式推出,把反贫困活动推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它已经成为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宏大变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贫困计划的顺利实施,依赖于社会稳定的条件,更为当前和长远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创造着条件,这正是它的深远意义所在。

扶贫开发为社会稳定创造着条件,从“七五”期间的实践看,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有效地缓解区域性贫困,消除伴随贫困而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众所周知,建国以来,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较高速度不断向前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到“六五”期末,全国尚有多达占农村人口总数13.1%的1亿多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他们大部分聚居在过去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形成一片片区域性的贫困面。这个问题如果久拖不得解决,非但党心不安,民心不安,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会影响到地域间、民族间的安定团结,削弱党与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七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各地加强了反贫困斗争,改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集中力量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现在,这个目标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据统计,到1990年底,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3000多万,大多数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一些扶贫开发进展较快的地区,如大别山贫困区,95%的贫困户已不为温饱二字发愁。江西老区贫困地区越过温饱线的贫(特)困户已达99%,在这些脱贫户中人均年纯收入300元上的达到90.6%,人均年收入500元以上的达12%。这就是说,经过5年反贫困

的艰苦努力,上述贫困问题得到有效地缓解,大部分贫困群众走出了长期不得温饱的困境,开始了安居创业的生活,一部分人已经接近或赶上了全国、全省农村住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已走上富裕道路。这个了不起的历史性变化出现,大快人心、大得人心。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感受尤为深刻,他们异口同声称颂扶贫开发给自己带来了精神上、经济上的第二次解放与翻身!反贫困第一阶段以取得解决温饱、缓解贫困的胜利增强了人心向党、向社会主义的向心力。

二是有效地启动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的活力,加速经济发展步伐,从根本上为社会稳定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经济运行,无一例外地陷于低投入、低速度、低效益、低收入的封闭式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滞缓,基础薄弱。扶贫工作则治表不治本,或无力治本。80年代以来抓扶贫开发,致力于治穷治本,增强贫困对象的自身“造血”机能,经济开发与社会工作较好地融合起来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和扶贫效益。以江西老区贫困地区为例,1990年与1985年比较,国家和省定点扶持的20个贫困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8.9%,年递增12.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0.8%,年递增8.6%;财政收入增长129.5%,年递增18.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一大批支柱性产业建立起来,农村产业结构逐年合理调整,多种经营发展迅速,农田基本建设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全省特困户的人均纯收入由150元增加到423元,增长1.8倍。各地人均建立了1亩以上旱涝保收田,户均建立1亩以上林、果或茶、桑园,户均有1个以上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特困户,大都达到占特困户总数的30%到50%左右,有的县、乡还高出这一比率。总之扶贫开发已经促使老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向着良性运行的方向转化,起步良好,活力增强,后劲增大,前景可观。贫困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对于我国当前与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有效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反贫困的实践表明,对贫困问题综合治理的成果,既反映在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上,也表现在精神文明的建树上。突出的是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社会风尚、社区服务功能都有了可喜的变化。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各地坚持做好人的工作,注重思想启动、观念更新。江西老区强调宏扬井冈山革命传统,艰苦创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河南固始县人民在反贫困中“宁肯苦干,不愿苦熬”。安徽金寨县提出“人穷志不短,扶贫靠精神”,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大干小难,小干大难,假干真难,真干不难”的切身体会,在省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贫困地区一扫过去“等、靠、要”的萎靡不振状态,增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斗志。此其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贫困县、乡的干部群众纷纷接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洗礼,价值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开始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来,一批善经营、会管理、有技术、能开拓的农村能人涌现出来,有的还成长为农民企业家。此其二。由于政府的组织与倡导,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了扶贫开发活动。部门定点挂钩扶贫形成制度,干部、党员包村包户扶贫,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发挥专长扶贫,乡村办经济实体、储金会扶贫,邻里亲朋互助,先富帮后富等等,构成了层次不同、功能互补的扶贫网络。反贫困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扶贫济困的社会风尚大发扬。此其三。随着反贫困斗争的深入开展,人们愈来愈感到文化贫困的掣肘和智力投资的迫切重要性。几年来,各地以国家扶持的资金为引子群策群力挖掘潜力,兴办了急需的文教卫生事业。特别是使用一部分扶贫资金坚持科技培训,仅江西老区5年来培训贫困县乡干部和群众即达272万多人次,使85%的特困户劳力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并招收了7万名贫(特)困户学员进农函大学习,已有5万人毕业。这

不但对提高扶贫开发收到了“吹糠见米”之效，而且对于贫困地区树立重知识、重人材新风也是一个促进。此其四。适应发展商品生产、规模经营的需要，贫困地区乡村的各种产、供、销服务组织，尤其是以科技扶贫科技兴农为己任的各类民间专业协会，如养猪协会、养鸭协会、西瓜协会、花生协会等在各地兴起，一批县办、乡办的科技服务实体也应运而生，标志着农村社区服务的功能在加强。此其五。江西老区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两手抓的经验被肯定和推广后，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此其六。

综上所述，开发式扶贫同社会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前提是扶贫，手段是开发，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既大量表现为经济活动，又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内容。经济开发与社会工作紧密结合，发挥着动力机制与稳定机制的作用，促使贫困地区加快了治穷致富步伐，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协调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反贫困要注重克服社会性障碍

贫困是“综合症”，既表现为经济贫困，又表现为文化贫困、社会贫困，如文盲率高，人口膨胀，封闭、保守，商品经济意识淡漠，劳动力素质低，社区功能不足等等。这都是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障碍。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对贫困问题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才能彻底攻克这个顽症。因此，在大力扶持贫困地区进行区域经济开发的同时，还必须注重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发育，克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性障碍。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强化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经济的观念，遏制人口过快增长，抓好智力开发和增强社区功能。

前面讲到，不少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在反贫困斗争中增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商品经济的观念，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之一。但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普遍地解决了。扶贫开发中一些屡见不鲜的现象仍然值得注意，如有些干部争钱、争物、争项目的劲头很大，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发展商品经济的水平不高，特别是自我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观念不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产品经济的经营思想和小生产者的习惯等，还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导致的是扶贫开发项目组织实施的低标准、低效益，以及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滞后。在今后的反贫困斗争中，继续强化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经济的观念，仍是当务之急。因此，一定要明确增强贫困县乡和贫困户的内在活力，不主要是指经济动力，还有决不能低估的精神动力。扶贫先扶志，也不只是专对贫困群众而言的，最重要的是焕发贫困县、乡领导与干部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经济，“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斗志。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自我发展过程，当地干部群众是各项发展政策的实施主体。如果他们囿于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和生活方式，安于现状，不图奋进，没有强烈的创业冲动，不能捕捉和把握到来的发展机遇，总是“两眼向上”，一味依赖外援，那么，即使扶贫的外力再强，发展政策再好，落实起来也必将是步履艰难，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这在过去10年的反贫困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它告诉我们，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必须进一步更新人们的观念，扫除思想上的阻力。特别要树立自立自强，自我发展意识，并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如规定要达成的积累指标、建立生产发展基金等，把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由号召变为现实。

人口增长过快是贫困地区治穷致富的一大制约因素。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越是人口生

产失控或半失控，这是造成贫困的重要症结之一，也是长期扶贫而不能脱贫的原因之一。据各地近几年有关调查资料，甘肃陇南山区文县堡子坝乡的寨子合作社，计划生育工作落后，被调查的两个自然村，生5个孩子的很普遍，30岁的社长已有9个孩子，还有生11个子女的。两个村共51户，只有1户不缺吃穿。江西万载县和宜春市6个特困乡的480户贫困户中，1981年以来的初婚妇女早婚率平均为32.6%，个别地方高达53.3%，有的15岁结婚，20岁已有2个小孩。婴儿有近3/4是计划外出生的，平均计划生育率只有28.4%，多胎率高达42.4%，最多的生了9胎。扶贫以后，这些户的收入虽有很大提高，但大大低于地、县同期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过快而使社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加剧，人均耕地、资源和收入水平降低，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与扶贫成果被冲消的问题，在贫困地区是较普遍存在的。所以，农村工作不抓人口控制不行，反贫困不抓人口控制更不行。只考虑经济开发，不重视社会开发，只抓生产问题，不抓人口问题，都不是完整的发展观。

贫困地区人的文化素质低，是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目前，全国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尚高达35%，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文盲率在60%左右。国家提出的90年代扶贫任务中，一个重要的指标要求是在贫困地区普及初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治穷要治愚”，在抓经济开发的同时，一定要抓紧智力开发、科技开发，加强对贫困地区劳动者及其后备军的培育，加强对干部和专门人才的培训，尤其是要搞好村级组织和班子建设，努力解决文化素质、干部素质低下问题。从现在起，只要不再贻误，用10~20年的时间打文化基础，悉心树人，将贫困地区基层干部、青壮年农民、特别是今日的中小學生、学龄前儿童即社会新成员，培养成为有革命理想、有文化知识和科技才能的建设者，那时，社会文化因素就将不是当地经济起飞的阻力，而是富有生机的内部活力，社区发展的自我组织能力必定加强，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有新的飞跃。当然，这方面有许多困难要进一步克服。这就要求上下一股劲，特别是县以上领导者和有关职能部门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挖掘潜力，坚持把教育扶贫、科技兴农的事情当作一件大事办好。

反贫困需要社会学

贫困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也能够消除贫困。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任务，又是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在这场反贫困斗争中，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意味着实现两个大转变，即实现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轨，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摆脱贫困，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扶持贫困地区加快这个变革步伐，既要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开发，又要努力促进社会发展，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消除社会障碍。扶贫开发应当体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以明确的协调发展战略思想为指导，在追求社会、经济、生态的整体效益上下功夫。防止和克服那种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建树；重资源采伐，轻生态保护；重经济增收，轻社会发展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这个方面有一些重要工作，如研究社会发展战略，提出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对策，制订反贫困的战略规划和阶段计划，建立扶贫开发的社会指标体系，强化政府的宏观指导和

扶贫行为等，都需要社会学界积极参与，并有必要列入社会学的课题研究计划。

扶贫开发是一项综合治理贫困问题的系统工程，在实践中新旧矛盾层出不穷，有许多复杂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其中具有共性的问题至少有12个方面，或称12大关系，即：突出重点与照顾一般的关系；富民与富县(乡)的关系；发展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关系；抓紧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资金投入与技术、人才、信息等综合输入的关系；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经济开发与生态平衡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关系；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扶贫工作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关系等。这些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直接影响到反贫困计划的实施和贫困地区治穷致富的进程。这些问题，大都是值得社会学从整体上或按专题去认真调查、深入研究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反贫困需要加强理论导向。前一阶段扶贫开发中，各地围绕首先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目标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不可否认，我们对于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注意得不够，其表现是理论宣传少，参与反贫困理论研究的力量薄弱，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理论成果少；扶贫队伍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有的地方和扶贫部门甚至轻视理论，视理论研究为空谈。在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新阶段的今天，面对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有必要强调进一步搞好理论导向的问题，希望引起主管部门和各级领导同志足够重视，积极组织扶贫部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素养，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并多出理论研究成果。社会学界在宣传、介绍发展理论，用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武装扶贫队伍方面，是应当有作为的。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应与反贫困实践紧密结合，力争尽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学。

总之，反贫困呼唤社会学，需要社会学。我们期望社会学为解决中国土地上的贫困问题作出更多贡献。

1991年3月于南昌

责任编辑：王 颖

武汉市社会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

武汉市社会学会第二届年会于1990年12月22日在江汉大学召开，来自社会学研究、教学 and 实际工作部门以及新闻单位的6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了论文20余篇。

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崇顺同志向大会作了题为“回顾与展望”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了工作报告。武汉大学周运清指出：社会对社会学的要求非常迫切，武汉市社会学的发展健康、活跃，市社会学会工作做得多、成绩大，因此建议编写《武汉地区社会学十年》。他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华中理工大学范洪指出：社会学的基础研究亟待提高，社会学要从宏观突破，把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联系起来。江汉大学殷良学针对学术界有人否认社会学是一个专业及专业方向不明确等批评，认为目前社会学进入发展的艰难时期。

武汉市社会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第二项重要议程是进行第二届理事会选举，选举刘中荣为第二届理事会会长。